

路径依赖与动态能力：
紫金矿业集团国际化案例研究

——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张 源

(里斯本大学学院 商学院,葡萄牙 里斯本 1600)

摘 要: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了紫金矿业的国际化进程,就乌普萨拉模型是否能对中国黄金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合适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提出了模型改进建议。文章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以紫金矿业为代表的中国新兴黄金企业如何进行海外投资及为何采用这种模式。研究发现:乌普萨拉模型的发展与其渊源理论(演化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发展同步性较差;就新兴中国黄金企业而言,企业知识因个体而异,且具有路径依赖性。这个特点决定了企业采用非渐进性资源投入,其国际化过程复制了其国内模式。国际化过程受到国家政策和产业特点影响,是能力悖论因素与动态能力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国际化进程;乌普萨拉模型;路径依赖;动态能力;紫金矿业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8)04-0035-11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新兴黄金企业纷纷走向海外,紫金矿业是其中重要一员。自 2005 年涉足海外市场以来,紫金矿业在超过 10 个国家进行了投资;根据 2016 年年报,其海外黄金资源储量 706.42 吨,占公司总量的 52.43%,国际化程度远超其他中国黄金矿业企业。但是,对于紫金矿业为何及如何进行海外投资这个课题,学界鲜有进行全周期历时研究者。就相关理论而言,乌普萨拉模型(以下简称 U 模型)虽是研究企业国际化的重要理论工具,模型创始人也引入了新变量进行完善^[1],并开始向其理论渊源进行有限回归^[2],但学界对其仍有质疑^[3]。因此,在中国这个特殊情境下,以紫金矿业为样本,通过对其国内与国外两个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分析的 U 模型的体系化、本源性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意义,对于正在走向海外的其他中国黄金企业也有借鉴意义。

一、文献回顾

Hymer^[4]是最早对企业国际化问题进行体系性研究的学者。根据他的垄断优势理论,企业通过跨国经营获得规模和知识上的垄断优势,进而取得垄断利润。Buckly 和 Casson^[5]提出了内部市场论,即跨国企业的子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内部交易市场解决知识与技术外部交易的低效问题。Johanson 和 Vahlne^[6]则开创性地提

修回日期:2018-05-31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省制造业跨越‘低端锁定’的路径研究”(17CTYJ14)。
作者简介:张源,男,山东济南人,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学院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企业国际化战略。

出乌普萨拉模型,认为国际化是企业逐步递进决策的结果,即企业倾向于在距离企业所在国心理距离近的国家进行渐进性资源投入。此后,企业国际化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Dunning^[7]、Oviatt 和 McDougall^[8]分别提出了著名的折衷论(企业对外投资需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和国际新创企业论(企业在创立之初就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以获得竞争优势);Luo 和 Tung^[9]提出了为获取战略资产、弥补其竞争劣势从而进行国际化的跳板论;Cheung 和 Qian^[10]提出了企业国际化是母国投资政策推动的制度论;Marjorie 等^[11]提出了将内向积累的经验向海外输出的内向论。但是学界仍认为 U 模型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12],Marjorie^[11]的研究也指出仍有大量中国样本企业的国际化遵循了 U 模型。

U 模型的核心要素是知识和心理距离,通过分析知识发展和逐步投入的互动、投资国与企业所在国心理距离的远近与投资顺序之间的关系,描述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特点。模型研究的背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悖反^[13];模型解释对象是企业的历时演化^[2];研究内容主要是经验学习和承诺构建^[14];研究重点是过程^[15]和心理距离^[16];补充模型例外很普遍^[17],动态能力^[2]和网络因素^[18]等新变量的研究成为热点。总之,U 模型仍是适合于企业国际化历时研究的工具^[3],其适应性得到认可^[19],这来源于模型的包容性^[18]。

U 模型是对外投资理论^[20],故其经济学理论渊源需要厘清。Cantwell 等^[21]认为 U 模型的特点是演化,Johanson 和 Vahlne^[22]进一步提出模型是用于解释企业历时演化的工具。实际上,演化经济学已被广泛用于国际化过程研究中^[14],这意味着 U 模型根植于演化经济学的土壤中。演化经济学的哲学范式(U 模型的起点)是广义达尔文主义,后者的问题是在经济与生物两个领域共通上还需要在具体领域中就具体问题提出补充性解释^[22];其本体论是层级观^[23],贯彻实现原则^[24],这为 U 模型四十年来不断产生例外做了注脚。演化经济学的另一组重要概念,时间假设^[25]和路径依赖^[26]为模型提供了历史观点和阶段性对比的理论依据。上述概念有助于理解模型的理论构成、演进中的问题、研究趋势和理论反思。

U 模型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企业理论也必须重视。企业理论发展的第一进路是基础资源观(RBV)到动态能力论^[27]。RBV 是 U 模型的直接理论渊源^[28],有助于从企业主体角度理解其国际化。企业是知识(惯例)的集合,其能力是显\隐性知识的集合^[29],拥有符合 VRIO 标准的资源的企业有竞争优势^[30],但如何取得优势则处于黑箱状态,动态能力论为此提供了答案^[31]。Leonard^[32]则认为核心能力随情景变化而变为障碍,心理承诺和路径依赖锁定是原因^[33]。第二进路是企业家理论^[34]。进路分析有助于理解为何 U 模型研究应注重分析企业能力、资源、知识,并考虑动态能力和企业家理论等因素。

U 模型被学者们从政策、行业^[3]等角度质疑,创始人也常引入新变量修改模型。理论研究缺陷在于缺乏对整体理论框架的审视,与其理论渊源发展不同步,导致了企业家因素的遗忘^[35]、新古典经济学的介入^[36]、研究区域和产业类型有限^[37]、研究方法名动实静^[38]等问题。理论创始人在近期研究中已向模型的渊源理论进行有限回归^[3],这是其试图将 U 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折中范式进行整合^[2]遇阻的结果,故不能说他们实现了模型与其理论渊源的贯通和同步演进。研究中的变量添加式修改和近期的工具性回归应归功为理论渊源的本源性引力。U 模型理论渊源的原生缺陷构成了模型演进的阻碍:一是演化经济学不成熟,概念尚未被广泛接受^[39],兴趣点存在分裂^[40],演化的具体特点未决^[41],缺乏明确论述与研究范式^[42],使作为基层工具的 U 模型缺乏清晰的顶层理论指导;二是企业能力理论中能力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显^[43],造成了 U 模型没有广域适应性;三是研究方法不统一,大量研究仍是均衡的^[44]。

综上所述,U 模型是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模型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工具。由于高层理论有原生性缺陷,基础工具的演进间或游离于高层理论内核的指引,同时又受到其渊源理论的本源性吸引而间或回归;对其效用本源性的质疑是缺乏对模型理论体系及其定位的理解,U 模型不能承载它作为基础理论工具所不应涉及的理论使命。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此采用编码分析法(编码方法包括时间码、事件参与方、投资关系和时间描述等;分析方法包括编码与模式对比等)研究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样本为中国紫金矿业集团,数据源包括文档、记录、个人观察等^[45]。紫金矿业集团在国内黄金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与其他黄金企业相比,其海外投资案例更多,且其海外投资行为被国内大量企业所效仿,因此选取紫金矿业为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更进一步地,本文也采用了三角互证、研究歧视规避和持续观察等多种方法,以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46]。

(一) 数据收集

数据源包括文档、记录、个人观察等。如表 1 所示,年报提供了产量、战略、投资等信息,紫金矿业的历史与文化是内部资料,提供除年报以外的信息细节;年鉴提供大事记。外部资料则包括 SNL 报告、世界黄金协会报告等,提供行业信息。

表 1 紫金矿业案例资料汇编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公司资料	2007-2016 年年报
	紫金矿业志
	紫金矿业年鉴 2011—2013
	SNL 紫金并购报告
行业资料	世界黄金协会黄金产业报告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黄金产业报告
	FRASER 世界矿业报告(2013)

(二) 编码

编码方法包括编制时间码、分析事件参与方和投资关系等。如表 2 所示,共有 34 个初始范畴,其中核心范畴有 8 个,A1~A3 是传统 U 模型范畴,用于分析 U 模型在紫金案例上的不适用性;B1~B5 是新范畴,构成了乌普萨拉改进模型(AU 模型),用于分析在紫金案例上的适用性。范畴的定义如下:A1(投资模式)指投资方式、地点和规模;A2(心理距离)指信息流隔断因素^[47];A3(市场知识)是指福建省外市场知识;B1(产业特点)是指资源获取方法、资源分布和经营特点等;B2(国家政策影响)指西部大开发政策、“走出去”战略

表 2 编码汇总

核心范畴	初始范畴	核心范畴	初始范畴
A1 投资模式	A11 投资方式	B1 产业特点	B11 资源获取方式
	A12 投资地点		B12 资源分布不均衡
	A13 投资规模		B13 矿业企业经营特点
	A21 经济		B21 国家政策
A2 心理距离	A22 教育	B2 国家政策影响力	B22 境外管理办法
	A23 政府激励		B23 企业股权结构
	A24 语言差异		B24 企业家身份
	A31 企业知识		B25 投资程序
A3 市场知识	A32 管理层知识		B31 人格
	A33 员工知识	B3 企业家影响	B32 人力资本
	A34 顾问知识		B33 企业文化
	A35 隐形知识		B34 企业战略
	A36 显性知识		B35 战略执行方式
	A37 人员流动率	B4 动态能力	B41 技术重构能力
	A38 转换媒介		B42 能外部观察能力
			B43 组织重构能力
		B5 能力悖论 因素	B51 结构惰性
			B52 认知陷阱
			B53 路径依赖与锁定

等;B3 (基于企业文化与战略的企业家影响)指个人人格、人力资源等;B4 (动态能力)指内外部观察能力、技术重构能力和组织重构能力;B5 (能力悖论因素)指路径依赖与锁定、结构惰性和认知陷阱^[33]。

三、案例研究

(一)概述

国内方面,2001—2014 年紫金矿业共投资 33 个项目,收购总金额约 4 亿美元,如表 3 所示。海外方面,共投资 16 个项目,投资总额约 12.26 亿美元,如表 4 所示。

表 3 紫金矿业国内投资汇总 单位:百万美元

时间	投资地	投资金额	投资方式	时间	投资地	投资金额	投资方式
2001	贵州	0.8	收购	2006	山东	11.3	收购
	安徽	1.0	收购		湖南	4.8	收购
2002	新疆	22.5	收购		山东	5.6	收购
	吉林	30.5	收购		云南	14.5	收购
2003	青海	11.6	收购	2007	福建	22.7	收购
	安徽	4.1	收购		云南	6.3	收购
	四川	3.9	收购		福建	5.6	收购
	西藏	2.5	收购		云南	10.7	收购
2004	云南	3.4	参股	2008		0.0	
	新疆	11.0	收购	2009		0.0	
2005	广东	16.5	收购	2010	内蒙	29.3	收购
	辽宁	12.1	收购	2011	陕西	11.1	收购
	西藏	39.3	参股		陕西	5.1	收购
	河北	5.5	收购	2012		0.0	
	山西	13.1	收购	2013		0.0	
	山东	4.0	收购	2014	福建	5.7	收购
2006	云南	4.1	收购		河南	113.0	收购
	黑龙江	15.0	收购		山西	14.3	收购
	山东	16.5	收购				

数据来源:紫金矿业年鉴 1986—2008 ; 2009—2016 年报(已并购项目的后续投资不计入)。表 4 同。

表 4 紫金矿业海外投资汇总 单位:百万美元

时间	地点	投资金额	投资方式	时间	地点	投资金额	投资方式
2005	加拿大	1.82	参股	2009		0.00	
2005	缅甸	21.80	收购	2010		0.00	
2006	南非	19.02	参股	2011	吉尔吉斯斯坦	66.00	收购
2006	蒙古	8.35	收购	2011	澳大利亚	25.73	收购
2006	俄罗斯	10.69	收购	2012		0.00	
2006	俄罗斯	43.80	收购	2013	澳大利亚	145.04	收购
2007	越南	4.84	收购	2014	南非	13.88	收购
2007	秘鲁	80.55	收购	2014	刚果金	19.90	收购
2007	塔吉克斯坦	55.10	收购	2015	刚果金	412.00	收购
2008		0.00		2015	巴布亚新几内亚	298.00	收购

(二) 编码分析

1.投资特点——U 模型范畴(A1)

就投资方法(A11)而言,国内方面,紫金矿业共投资 33 个项目,31 个是收购,2 个是参股。在首笔投资之前,紫金矿业并未进行探索性机构设置以便收集信息。因此,国内投资基本是采用收购方式,没有经过阶段性探索。海外方面,共投资 16 个项目,也以收购为主。需要注意的是 2005 年,紫金矿业同时进行了两笔投资,资料无法证明加拿大项目(参股)早于缅甸项目(收购)启动,即不能说先参股后收购。因此,紫金矿业的海外投资也是以收购为主,且没有经过阶段性探索,与国内模式相同。就投资地地理位置选择(A12)而言,国内方面,2001—2003 年,共投资 8 个项目,分布于和紫金矿业所在地不相邻的贵州等 7 省。海外方面,如以资源量或产量进入全球前 20 位为标准定义矿业大国,则紫金矿业海外投资目的国中有 9 个符合标准,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 90%以上。可见投资呈现资源导向性,未就近投资,与国内模式相同。就投资力度(A13)而言,国内方面,从数据看是降—升—降—升的过程,2008—2009 年经济危机期间无投资。这不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而是波浪形发展。海外方面,投资额也成波浪形,无渐进趋势。因此,紫金矿业的海外投资与其国内投资模式类似,即呈波浪式前进。

2.心理距离——U 模型范畴(A2)

根据易江玲^[48]对心理距离定义的总结,本文用于国内投资的心理距离测量的维度定为政府激励、语言、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国内方面,就投资地经济水平(A21)而言,根据陈国艳^[49]对各省经济水平的研究,紫金矿业并未选择与其所在省份经济水平相近的省份进行投资。就投资地教育水平(A22)而言,根据陈钊等^[50]的研究,紫金矿业并未限于选择与其所在省份教育水平相近的省份进行投资。就投资地政府激励水平(A23)而言,根据Tung和Cho^[51]对投资激励水平的研究,紫金矿业并未限于选择与其所在省份投资激励水平相近的省份进行投资;就投资地语言差异(A24)而言,从郑锦全^[52]对各省方言沟通度的角度,紫金矿业并未限于选择与其所在省份语言相似度较高的省份进行投资。可见,紫金矿业在国内投资时并不存在心理距离这个因素。海外方面,2005 年,紫金矿业同时对缅甸和加拿大进行投资,根据 Blomkvist 和 Drogendijk^[53]的研究,缅甸和加拿大的心理距离分别是34.1和 92.7(见表 5),后者几乎是在心理距离上离中国最远的国家。2005—2016 年,投资国与所在国(中国)的心理距离并非从近到远。因此,心理距离概念在紫金矿业的海外案例中不适用。

表 5 投资国心理距离

国别	心理距离	国别	心理距离
加拿大	92.7	塔吉克斯坦	NA
缅甸	34.1	吉尔吉斯斯坦	NA
南非	51.26	澳大利亚	66.83
蒙古	NA	南非	51.26
俄罗斯	58.55	刚果金	40.3
越南	24.58	巴布亚新几内亚	52.61
秘鲁	52.04		

3.市场知识——U 模型范畴(A3)

国内方面,就公司知识(A31)而言,2001 年前紫金矿业无省外投资,公司层面并无以官方资料记录的成体系的省外知识。知识积累更多体现在领导人和员工的个人层面。就管理人员知识(A32)和员工知识(A33)而言,当时的投资管理人员和团队成员在对外投资前都缺乏省外矿业项目投资经验(以领导人身份负责过市场化跨省矿业投资项目)。就顾问知识(A34)而言,紫金矿业在进行省外投资中没有雇佣顾问,可认为顾问没有提供知识。海外方面,2006 年以前没有以官方资料记录体系性海外知识,2013 年开始建立系统性数据库,但仍不完善。员工层面,如同国内方面,从资料分析也无海外矿业投资经验(以领导人身份负责过市场化跨国矿业投资项目)。从顾问角度,紫金矿业历来不依靠外部,顾问只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员工的知识,在公司层面留下的是大量的文档资料,而没有留下隐性知识。

就知识载体与转化媒介(A35~A38),即隐形知识(A35)、显性知识(A36)、人员流动率(A37)和转化媒介

(A38)而言,人员与企业间的隐\显性知识转化对于理解企业行为很重要。国内方面,国内投资部门的离职率和调动率较低,2006—2014年,年均人员流动率(A37)低于50%,且核心技术团队长期保持稳定,这使得员工层面的隐性知识长期稳定存在。但是,公司层面和部门层面以官方资料记录的成体系的市场知识积累仍在完善中,这表明显性知识并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培训还处于对员工进行矿业知识和规章制度的基础性普及阶段,有经验的员工无法通过组织工具将其核心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亦即企业缺乏有效的知识转化媒介(A38)将隐\显性知识进行转化。海外方面,国际投资部门的离职率和调动率较高,2006—2014年,年均人员变动率(A37)超过50%,这使得员工层面的隐性知识无法长期稳定存在。公司层面和部门层面以官方资料记录的体系性知识也还在积累和完善中,表明真正的显性知识没有形成(A36)。同前述原因,有经验的员工无法通过组织工具将其隐性知识(A35)转化为显性知识,也缺乏有效的知识转化媒介(A38)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综上所述,从公司和员工两个层面,紫金矿业在缺乏市场知识的前提下进行对外投资,是摸着石头过河;投资方式是固定的(收购),投资力度则呈波浪形,可见,市场知识、紫金矿业的固定投资方式和波浪形的投资力度三者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

4.行业特点——AU 模型范畴(B1)

从资源获取方式(B11)而言,据SNL统计,2004—2014年4月,全球共有114起黄金项目并购,收购资源量为1.48亿盎司,高于勘探一倍,据2016年年报,紫金矿业2017年计划投资109.7亿元人民币,30倍于其勘探投入,可见紫金矿业主要资源获取方式是收购。就投资方法(A1)而言,主要方法是收购。在这个意义上,投资方法(A1)与资源获取方式(B11)相关。就资源分布与潜力的不均衡性(B12)而言,国内方面,矿业资源呈现不均衡分布,据张雷^[54]数据,西部拥有全国铜矿资源的41.6%和金矿资源的31.2%,东部潜力及产出情况不如西部。可见投资方法(A11)、资源获取方式(B11)也与资源的不均衡相关。海外方面,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2014年数据,14个矿业大国拥有超过全球80%的黄金资源,可以解释紫金矿业为何聚焦于矿业大国。根据FRASER矿业报告的标准,紫金矿业海外投资的国家中7个是高风险国家。就矿业企业的经营特点(B13)而言,企业经营易受世界经济波动、事故的影响。无论国内还是海外,2008—2010年紫金矿业投资为零,这与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此外,根据紫金矿业2010年年报,当年重大事故也是造成各项投资中断的原因。因此,投资规模(A13)与矿业企业的经营特点(B13)相关。

5.基于企业性质的国家政策影响力——AU 模型范畴(B2)

就国家政策(B21)而言,国内方面,由于其国企身份,紫金矿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紫金矿业年鉴明确指出:公司积极实施西部开发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首笔收购就在西部的贵州。2001—2004年,在紫金矿业进行收购的10省中,7个在西部。可见,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政策(B21)影响了紫金矿业的投资方式中投资地点(A32)的选择。海外方面,就走出去战略与境外管理办法(B22)而言,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是紫金矿业进行海外收购的重要原因。2004年末政府正式下文“走出去”,2005年紫金矿业就完成首笔海外投资。就企业性质(B23)而言,紫金矿业是国有相对控股。就企业家身份(B24)而言,企业家与普通民营企业管理者不同。政府在投资程序中有较大发言权,同时企业家对企业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就投资程序(B25)而言,对于国内外重大投资决策,国有资产管理方的意见权重很大。因此,投资地点受制于政府政策,同时间接与紫金矿业的企业性质相关。综上所述,国家政策(B2)直接影响了紫金矿业的国际化投资方式(A3)。

6.基于文化与战略的企业家影响力——AU 模型范畴(B3)

Gartner^[55]提出了衡量企业家的两个维度:人格与人力资本。就人格特质(B31)而言,作为客家人,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先生具有冒险精神,肩负着将紫金矿业推向国际市场的使命,拥有勇敢人格。就人力资本/类型(B32)而言,陈景河先生兼具地质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的三重属性。紫金矿业的文化(B33)则聚焦于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紫金矿业的战略(B34)是成为高科技的高效国际化矿业集团。就战略执行方式

(B35)而言,以金铜矿产为主业,项目证券化、大型化意味着海外投资地点选择需要聚焦于金铜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这解释了为何最初不从组建办事处开始逐步增加投资,而是开始就并购,且投资力度上是抓大放小,并非循序渐进。因此,人格特质(B31)、企业家类型(B32)、企业战略(B34)和战略实施方式(B35)对投资方式(A1)有相当影响。

7. 动态能力——AU 模型范畴(B4)

就观察能力(B41)而言,我国于 2000 年开始西部大开发,紫金矿业 2001 年就完成了首笔西部投资,可见紫金矿业有敏锐政策观察力,这实际取决于以陈景河为首的企业家群的独特眼光。换言之,企业观察能力(B41)根植于企业家因素(B3)而与国家政策(B2)紧密相连。就技术重构能力(B42)而言,紫金矿业拥有行业最全研发部门和首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创新传统。国内投资中(如贵州水银洞和吉林珥春项目),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外投资中,超过一半的海外项目有技术难度,紫金矿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推动海外项目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组织重构能力(A43)而言,国内方面,2006 年前,紫金矿业不断进行环境适应性组织调整,从聚焦于紫金山金铜矿的紫金矿业公司—项目公司架构,转变为集团公司—区域公司—项目公司三级管控,实现了公司区域化管理。海外方面,2006—2016 年没有实质变化,组织演进仍在寻找适合投资步伐的定位。可见紫金矿业的动态能力(B4)决定其海外投资方式(A1)。

8. 能力悖论因素——AU 模型范畴(B5)

国内方面,就能力悖论的三要素而言,紫金矿业在国内发展阶段非常灵活,能迅速调整组织架构,不存在组织惰性;企业勇于走向西部,不依赖企业总部所在地的旗舰项目,不存在认知陷阱和路径依赖锁定问题。可见紫金矿业拥有完全动态能力,突破了能力悖论的三个因素的束缚。海外方面,其结构在 2006—2016 年没有实质性改变,在这一阶段存在组织惰性;在海外基本复制了其国内发展模式,这就是认知陷阱和路径依赖锁定的作用。可见紫金矿业在海外只拥有初级动态能力,其国际化发展基本复制了国内模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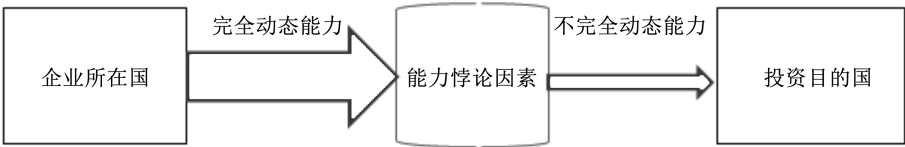


图 1 能力悖论因素与动态能力的关系

(三) 乌普萨拉改进模型(AU 模型)

如前文所述,紫金矿业的国内和国际投资有相同特点,在资源投入力度上呈现波浪形前进的趋势,并非逐步增加投入;投资方式上以收购为主;投资地点选择上与心理距离无关。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式与市场知识无关,体现出路径依赖的特点。就影响因素的知识载体和动态能力而言,首先,从知识角度讲,国内阶段虽然隐性知识无法转化为显性,但因知识载体的人员变动率较低,隐性知识仍能发生作用。但是国际阶段既不能实现隐\显性知识的转化,知识载体也不稳定,知识难以发挥作用。其次,紫金矿业在国内阶段拥有完全的适应国内环境的动态能力,而在国际阶段没有适应国际环境的动态能力,只拥有初级或不完整动态能力。再次,由于在国内阶段拥有完全的动态能力,紫金矿业可以突破能力悖论因素束缚,在国际阶段则难以做到。影响因素进一步可分为内外两组:一是内部因素,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企业家是知识的载体之一;二是外部因素,国家政策与动态能力的关系的焦点在于机会捕捉。行业因素与动态能力的关系则表现在技术重构能力上。可见,在五个影响因素中,动态能力有效连接了其他因素。

因此,基于紫金矿业的案例研究,以紫金矿业为代表的新兴中国金矿公司的国际化模型可以总结如下:新兴中国黄金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与其国内发展模式类似,其原因在于路径依赖;模式的特点是固定投资方式,固

定地点偏好,投资规模的非渐进性,这是在国家政策和产业影响背景下,基于企业家因素的动态能力和能力悖论因素博弈的结果。此模型可称为乌普萨拉改进模型(AU模型;Amendment of U model),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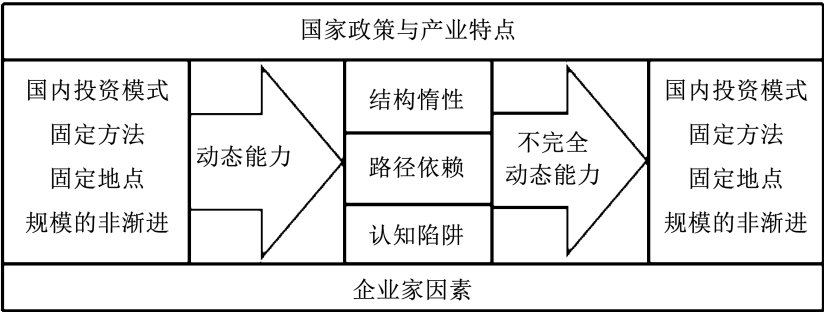


图2 乌普萨拉改进模型总结

第一,国内外模式的复制是能力悖论因素和动态能力博弈的结果。企业能力分为运营能力和动态能力^[56],紫金矿业的国际化阶段能力介于二者之间,是初级\不完全动态能力(但不是普通的运营能力),无法应对能力悖论因素,需要在国际化阶段复制其国内发展模式。

第二,模式的特点是固定方法、固定地点偏好、规模的非渐进性。由于独特的资源获取方式,紫金矿业选择收购作为主要的投资方法;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衡,且企业家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紫金矿业选择投资高风险矿业大国,即投资方法和地点、产业特点、企业家因素相关。

第三,模式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紫金矿业企业家群是高风险承受的技术专家、政治家、企业家三重身份,注重创新,紫金矿业的投资受到国家政策的巨大影响,国内外投资皆如此。就投资方法而言,产业的特点对模式有相当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紫金矿业的国内投资模式是:固定方法,即收购;投资规模具有非渐进性,这两点都和企业的市场知识无关,但与产业特点相关;固定地点偏好,与心理距离无关,但是与国家政策影响和企业家相关。海外发展模式与国内模式类似,一是固定方法,亦即收购;二是固定地点偏好,即倾向投资于高风险的矿业大国;三是投资规模呈现波浪式发展。投资方法和投资规模与市场知识并无关联,但是与产业特点相关。投资地点的选择与心理距离无关,而与国家政策和企业家相关。

由于投资特点(现象)和心理距离以及市场知识(影响因素)无相关性,U模型在紫金矿业的案例中并不适用。新变量如产业特点、国家政策和企业家影响等被证明与投资特点有相关性。同时,通过分析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的企业动态能力和能力悖论因素之间的互动,紫金矿业的国内外发展模式的相似性得到解释,即由于在国外没有完全的动态能力,企业在国外复制了其国内投资模式。这5个新变量构建起乌普萨拉改进模型,即新兴中国黄金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与其国内发展模式类似,具有固定投资方法、固定投资地点偏好、非渐进投资规模的特点,是在国家政策和产业特点影响背景下,能力悖论因素与动态能力博弈的结果。

本文尝试提出了U模型的三层综合体系理论范式\框架,增加了新的研究情景,引入了新的理论概念,提出了模型改进建议,对于国际化过程理论的体系性思考、情景角度分析和中国新兴黄金企业的海外实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一,研究通过理论渊源溯源、理论历史分析、理论缺陷比较,尝试将经济学层次的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层次的动态能力理论,具体分析工具层次的U模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推进理论衔接,力图将其融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现有国际化过程理论研究中,基础理论的发展偏离其中高层理论渊源指引的问题,也指出了未来理论发展系统性思考的必要性,厘清了U模型的工具性性

质,点明了对其效用质疑的原因是缺乏对模型理论体系及其定位的理解,模型不能承载它作为基础理论工作所不应涉及的层次。综合性理论框架或范式或将是未来研究重点,但应注意同一理论体系下不同层次理论的同步推进及相互影响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演化固守。第二,研究增加了新的情境,即位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国有相对控股、从事矿业行业的紫金矿业集团。第三,研究延伸了时间跨度,从国际阶段延伸到国内阶段,避免对企业发展周期的割裂性分析。第四,研究引入了不完全动态能力的概念,通过对比,在国内被证明是完全的动态能力,到了海外则退化为不完全动态能力,指出了动态能力的阶段性发展和具体情境导向性。第五,为新兴中国黄金企业走向海外提供了可行的指导工具,通过分析识别其国内动态能力和国外情景,然后得出是否在国外情境下仍具有完全的动态能力,以便决定是否国际化及如何国际化。

参考文献:

- [1]VAHLNE J E, JOHANSON J. The Uppsala model on evolu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 from internalization to coordination of networks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13(3):189-210.
- [2]VAHLNE J E, JOHANSON J.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evolution: The Uppsala model at 40 yea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7(9):1087-1102.
- [3]FORSGREN M A. Note on the revisited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the implications of business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6(9):1135-1144.
- [4]HYMER S M.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investment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6.
- [5]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London:Macmillan,1976.
- [6]JOHANSON J, VAHLNE J 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1):23-32.
- [7]DUNNING J H.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M]. London: Uuwin Hyman,1988.
- [8]OVIATT B, MCDUGALL P.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 (1):45-64.
- [9]LUO Y, 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4): 481-498.
- [10]CHEUNG Y W, QIAN X.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9(3):312-341.
- [11]MARJORIE L, LI D, YAN H. Chinese outward FDI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learning [J].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 2014(3):411-437.
- [12]肖文,陈益君.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一个文献述评[J].*中南大学学报*,2008(1):17-22.
- [13]JOHANSON J, VAHLNE J E. Management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J]. *Scandinav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992(3):9-27.
- [14]VALNE J E, IVARSSON I, JOHANSON L. The tortuous road to globalization for Volvo's heavy truck business: extending the scope of the Uppsala model[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1(20):1-14.
- [15]MEJRI K, UMEMOTO K.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owards the knowledge-based model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0(8):156-167.
- [16]BARKEMA H G, BELL J H J, PNNINGS J M. Foreign entry, cultural barriers, and learning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2):151-166.
- [17]JOHANSON J, VAHLNE J E.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0(4):11-24.
- [18]JOHANSON J, VAHLNE J E.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 revisited: from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o liability of outsider ship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9):1411-1431.
- [19]COVIELLO N, KANO L, LIESCH P W. Adapting the Uppsala model to a modern world: macro-context and microfounda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9):1151-1164.

[20]朱巧玲,董莉军.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及评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5):26-32.

[21]CANTWELL J, DUNNING J H, LUNAN S M.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y: the co-evolution of MN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4):567-586.

[22]HODGSON G M, KNUDSEN T.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M]. U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23]HODGSON G M.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M]. U.K: Edward Elgar,1999.

[24]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及其实践指导价值[J].当代财经,2010(7):5-11.

[25]EBNER A. Understanding varie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oncept of economics. In John Groenewegen, Jack Vromen. Instit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Implic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M].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26]LEE R P, SILKE G. Path-dependence, lock-in and student perceptions of nuclear energy in France: implications from a pilot study [J].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15(8):86 - 99.

[27]谷奇峰,丁慧平.企业能力理论研究综述[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7-22.

[28]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9]ZOLLO M, WINTER S G.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2(3):339-351.

[30]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99-120.

[31]刁昫,李凤.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综述[J].现代商业,2014(30):160-162.

[32]LEONARD D A. 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S1):111-125.

[33]SCHREYOGG G, KLIESCH-EBERL M. How dynamic c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be? towards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apability dynamiz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9):913-933.

[34]LEWIN P, PHELAN S E. An Austrian theory of the firm[J].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000(13):59-79.

[35]AXINN C N, MATTHYSSENS P. Limi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ies in an unlimited world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02(5):436-449.

[36]FIGUEIRA-DE-LEMOES F, JOHANSON J, VAHLNE J E. Risk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note on the Uppsala model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1(46):143-153.

[37]PRASHANTHAM S, YOUNG S. The internet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 promis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004(1):153-175.

[38]TYKESSON D, ALSERUD M. The Uppsala model's applicability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of European SMEs, today: a case study of thre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D].Lund University, 2011.

[39]HODGSON G M. Meaning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J]. Journal of Economics Methodology, 2007(2):211-226.

[40]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M].贾根良,刘辉锋,崔学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1]SILVA S T, TEIXEIRA A C. On the divergence of research path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account [A]. Germany: Philipps University Marburg,2006.

[42]杨虎涛.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合理性、相似性与差异性[J]. 2006(6):89-94.

[43]D'AVENI R A, GUNTHER R E. Hypercompetition: managing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M].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44]PRIEM R L, BUTLER J E.Is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1): 22-40.

[45]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2nd ed) [M].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46]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th ed) [M].Port Alegre: Bookman, 2001.

[47]VAHLNE J E, WIEDERSHEIM P F. Ekonomisktavstand: modelloch empirisk underso kning (Economic distance: mode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M].Uppsala: Almqvist Och Wiksell, 1973.

[48]易江玲. 心理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D]. 南京:南京财经大学, 2011.

[49]陈国艳.基于中国各省 GDP 的经济区域划分统计方法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50]陈钊, 陆铭, 金煜. 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 世界经济,2004(12):25-31.

[51]TUNG S, CHO S.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ax incentive policy[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 Accounting, 2001(2):167-185.

[52]郑锦全.汉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J].中国语文,1994(1):35-43.

[53]BLOMKIVST K, DROGENDIJK R. The impact of psychic distance o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3(5):659-686.

[54]张雷.中国矿产资源持续开发与区域开发战略调整[J].自然资源学报, 2002(2):163-167.

[55]GARTNER W B. Who is an entrepreneur? is the wrong ques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1988(4):11-31.

[56]CEPEDA G, VERA 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a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5):426-437.

Path Dependence and Dynamic Ability: A Case Study of Zijin Mining Group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Uppsala Model

ZHANG Yuan

(School of Business, Lisbon University Institute, Lisbon 1600, Portugal)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Zijin Mining Group Ltd. as a case study, analyzes whether the Uppsala model can provide a suita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China gold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model. Two questions are mainly addressed: how do China emerging gold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Zijin Mining make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why do they adopt such a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ppsala model is not synchronous with that of its origin theor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nterprise theory) and that for newly emerging China gold enterprises, enterprise knowledge varies with path dependence. This characteristic determines that the enterprises adopt non-progressive resource input and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replicates their domestic mode.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s influenced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game between capability paradox and dynamic capability.

Key words: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Uppsala model; path dependence; dynamic capability; Zijin Mining

(责任编辑 高 琼)